

纪念杨廷宝诞辰一百周年

ACADEMIC BOOK SERIES FOR MEMORIAL 100TH
ANNIVERSARY OF YANG TINGBAO'S BIRTH

1901-2001

杨廷宝建筑设计作品选

SELECTED ARCHITECTURAL WORKS OF YANG TINGBAO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纪念杨廷宝诞辰一百周年学术丛书
ACADEMIC BOOK SERIES FOR MEMORIAL 100TH
ANNIVERSARY OF YANG TINGBAO'S BIRTH
1901-2001

杨廷宝建筑设计作品选

SELECTED ARCHITECTURAL WORKS OF YANG TINGBAO

东南大学建筑系
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

名誉主编	齐 康	钟训正
主 编	韩冬青	张 彤
编 委	曾 琼	李海清
	屠苏南	王海宁
	张 慧	皮志伟

中国建筑工程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杨廷宝建筑设计作品选 / 东南大学建筑系, 东南大学
建筑研究所编.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10
(纪念杨廷宝诞辰一百周年学术丛书)
ISBN 7-112-04776-5

I. 杨… II. ①东…②东… III. 建筑设计—作品
集—中国 IV. TU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1297 号

纪念杨廷宝诞辰一百周年学术丛书

ACADEMIC BOOK SERIES FOR MEMORIAL 100TH
ANNIVERSARY OF YANG TINGBAO'S BIRTH
1901—2001

杨廷宝建筑设计作品选

SELECTED ARCHITECTURAL WORKS OF YANG TINGBAO

东南大学建筑系

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

名誉主编 齐 康 钟训正

主 编 韩冬青 张 彤

编 委 曾 琼 李海清

屠苏南 王海宁

张 慧 皮志伟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制作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毫米 1/16 印张: 11 $\frac{3}{4}$ 字数: 368 千字

2001 年 10 月第一版 2001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定价: 120.00 元

ISBN 7-112-04776-5

TU·4265(10257)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本社网址: <http://www.china-abp.com.cn>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building.com.cn>

纪念杨廷宝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1901-2001



目录

杨廷宝的建筑学术思想——纪念杨廷宝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齐康	001
恩泽绵长——忆杨老	钟训正	009
现实主义建筑创作路线的典范——杨廷宝建筑创作思想探讨	潘谷西等	012

作品

京奉铁路沈阳总站	019
少帅府	023
同泽女子中学	029
东北大学体育场	032
国立清华大学总体规划	034
清华大学气象台	035
清华大学图书馆扩建工程	037
清华大学生物馆	041
北京交通银行	044
中央体育场	048
中央体育场田径场	049
中央体育场篮球场	053
中央体育场国术场	055
中央体育场游泳场	056
紫金山天文台	058
中央医院	066
谭延闿墓	071
中山陵音乐台	082
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扩建工程	090
国立中央大学南校门	092
南京工学院大礼堂扩建	093
南京工学院中大院扩建	094
原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	095
大华大戏院	102
美丰银行	106
下关火车站扩建工程	108
成贤小筑	110
国际联欢社扩建工程	112

北极阁住宅	117
新生俱乐部	122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	125
延晖馆	129
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办公楼	135
和平宾馆	137
华东航空学院教学楼	143
淮海战役革命烈士纪念塔	152
南京民航候机楼	156
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方案	158
杨廷宝先生设计作品一览	161
杨廷宝先生生平	179
后 记	180

杨廷宝的建筑学术思想 ——纪念杨廷宝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齐 康

今年是杨廷宝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回想先生在我们身边的日子,真是百感交集。

二十年前,我和郭湖生同志曾为《杨廷宝建筑设计作品集》一书撰写了前言,十易其稿,而今天在祖国大踏步前进之中,在自身学术和设计实践的进步中再反思杨廷宝的建筑学术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杨廷宝先生,河南南阳人,出生于1901年,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曾为中学校长,受到革命进步的思想影响。他读过私塾,1915年被选拔进入北京清华学校,开始受到传统文化教育,继而又受到美国教育思想的影响。在清华期间学校正在建清华大礼堂,他到庄俊先生的工地图房看图,又受到美国老教师斯塔女士绘画的熏陶,所以在1921年赴美留学时决心学习建筑。可以认为传统的、开放的社会教育思想和影响都在他的思想意识之中潜移默化,杨老读过四书五经,又学习了进步文化,不能不说在他身上印下了双重烙印。他幼小丧母,自小受父亲的教诲,为人朴实求进。他在学习上主动刻苦,跳班又给了他超越的锻炼。在清华时与闻一多等人在学校举办绘画学习组,有着优良的审美意识,可以设想他的青年时代既有踏实、循序渐进的求学作风,又有卓越的美术和业务才能。斯塔女士曾劝其学美术,为他学建筑而遗憾。杨老虽未能如其愿,但师生深厚的情谊留在他的心底。

在一个人的一生中,青年时代的教育、经历、性格不能不说对他日后的学习产生重要的影响,踏实的作风,一步一个脚印,既循序又超越是他稳中求进、传统更新的思想基础,可以概括为纯朴而踏实。这奠定了他的伦理道德规范和模式。

去美国留学,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建筑是他的志趣。他的建筑设计和水彩画得到保尔·克芮和瓦尔特·道森的指导。保尔·克芮是当时美国最著名的在新古典主义影响下的建筑师。保尔·克芮曾在巴黎美术学院(Ecole de Beaux-Arts)学习和任教,参加过一次世界大战服兵役,他的听觉受到战争炮火的影响。杨廷宝的主动学习、刻苦钻研的求学精神深得老师的赏识。杨廷宝学习是优异的,多次获得全美建筑系学习设计竞赛的优胜奖。他曾自述道:“当时许多美国孩子都不用功,设计题目发下后,常出去玩,有的很不用功,就要我为他们做草图并帮助设计。当老师为他们一个个改图时,我就站在边上,老师改他们的图就等于改我的图。这样对我来说,做一个设计就等于做了几个设计。”又说:“我总按老师的要求,一步步按时交草稿。我从不开夜车赶图,养成了我不开夜车、循序学习的习惯。”青年时代学习上的争取主

动成为一种求知的习惯,这种主动出自于勤奋,出自于对专业的爱好和钻研。所以在古典建筑的研究如比例、尺度、陪衬、整体和局部的关系、局部与细部的关系各方面得到了一种整体和本体的训练。他具有一种造诣很深的古典基础训练,使他得以掌握和融汇建筑设计的步骤和方法。这种整体和本体,使其获得一种建筑美学的内在精髓。

我们知道人类的建筑审美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要经受教育和训练,人类对建筑美的审视是几千年人类文化的结晶。建筑受到技术、安全、适用的影响,而审美却融贯其中。这种有形、无形的影响是一种融贯、融合,更是一种贯通。建筑的功能、技术、材料虽然在变迁,一种无形精神却寓于其中。环境的建筑美、自然的风景美,都是一种内在力的反映,人们都能从物质中获取美的感觉和感应。杨廷宝说:“人不能生而知之,可以感觉和感应,要成为一名优秀建筑师,要有刻苦的训练和自己的判断。美不只是外表,更重要是内在的。”又说:“美的训练是可以适应的,一种心、手、物的结合”。总之要训练自己有一种建筑美的心灵和能表达的手。

杨廷宝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后,他的老师留他在事务所工作。这一段时间的工程实践对他的基本功的实践十分有用。杨廷宝说:“当时老师要我留下,协助他做一座纪念馆的施工图,在做到大门铁件时,老师要我一定到工艺加工的工场去实地观察、了解。这对我画施工图十分有用,使我知道铁件制作的全过程,什么样的画法可以成形,什么又是不可成形的,也使我知道了建筑工程工艺加工的重要性。这种锻炼使我一生也难忘,如果没记错的话,那家工艺加工场名为Samul Yalon。”留在老师事务所工作,在保尔·克芮的指导下从学校到事务所直至工地,使他获得建筑设计的全过程。实践就成为他从过程中学习建筑的起点。

1926年离美赴欧洲考察建筑,他作了大量的水彩画,准确描绘建筑对象,表现光影色彩,对西方建筑特别是古典建筑有着更深更具体的形象把握。他的水彩画是十分优秀的,不只是一位建筑师的作画,而且是一种美术家对建筑美的欣赏。70年代末在出版他的水彩画集时,挑选画页的著名画家邵宇曾夸奖说:“没有想到在建筑界有这么一位优秀杰出的画家。”我想至今建筑界也少有建筑画超越他和童寯老师建筑水彩的水平。他持续作画一直到他的晚年。他在回忆中说:“我们的时代正是从新古典转向现代新建筑,就是我的老师的作品也随着时代转换。”这说明一位建筑师的作品,是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是一步步的转换,他曾说过:“在这转

换的时代两种建筑形式的‘搭接’正是我从事建筑设计进程中经历的过程。”从新古典至现代，他亲眼并从实践中看到这过程，从他实践的身影中深感转换是一种职业建筑师必备思想和手段，以适应当时各种业主、各种建筑性质的需求。建筑师的职业是要在时代建筑形式转换和变迁中去适应、去创造和创新。

1927年他回国投入到中国土地上的建筑设计中，他的职业活动发生了一种巨大的变更。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建筑观，在分析建筑作品时，必须将建筑的进程落在一定的时间、空间上来分析。杨廷宝回国从事建筑设计事业是自1927年加入基泰工程司开始的。应当说这是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最早的建筑事务所之一，当然往后还有庄俊、沈理源、范文照、董大酉、赵深、陈植、童寓（后三人合作华盖建筑事务所）、徐敬直、李惠伯等事务所，他们的工作和活动，构成中国近代建筑设计活动的重要内容。基泰工程司以关颂声为首，朱彬、杨廷宝、杨宽麟参与建筑事务（其后梁衍、张博等人也参加一段时间），杨廷宝是建筑设计主要负责人。但是他们处的是解放前的旧中国时代，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经济贫穷落后，广大地区仍为农业社会，仅上海、天津、南京、广州等几个城市有一定规模的建设，但也是掌握在帝国主义列强和反动统治者手中，许许多多的建筑设计被外国人垄断。他们一批留学归来的中国青年建筑师出色地设计了一批公共建筑和民用建筑，开创了中国近代建筑设计事业和建筑活动，从而打破了外国人对这一领域的垄断。他们是当代建筑师的开路人。早期建筑师当中，最早崛起的代表人物要数吕彦直，他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和南京中山陵，至今可视为划时代的杰作，是一种中西建筑文化的融合，可惜他不幸英年早逝。接下来是一批二十年代留学归来的青年建筑师，他们继续开拓和探索。杨廷宝就是这批建筑师中出类拔萃的一位，成绩卓著，驰誉当世，五十多年来，他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建筑设计活动经历了不平凡的岁月，设计作品逾百件。

基泰的建筑活动接触统治阶级的上层，有较多的实践机遇，所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半个多世纪中国建筑发展的进程，这是时代给予的历史地位。

一位建筑师的设计活动，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离不开他所经历的学习和工程实践，更离不开同代人。杨廷宝的同代人均受到海内外建筑风俗的影响，观察杨廷宝的一生，他的设计无不打上了时代的印记。他在当时社会的影响中，在所受到的制约中，做出了杰出的优秀作品。在解放前受到外

来建筑文化的禁锢，解放后的初期又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即使在这种艰难条件下，他仍然做出了设计的最强音，这是难能可贵的。

从学习经历来分析，他自幼接受过传统文化，继而受到西方建筑教育及文化的影响，再经过国外和中国的建筑设计实践，有深厚的融合中西建筑文化的基础。一条从新古典到新建筑的历程。

从建筑设计的社会背景来分析，解放前中国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基泰工程司依附于上层社会，有机遇得到众多的公共建筑和小住宅、学校的设计实践。解放后的前三十年，虽然建设量不大，他参与并指导国家级、省级的重大工程，并不断地参与建筑设计实践的活动。实践活动及理论的认识是他的学术主线。

从创作的实践分析，在解放前，他和同辈人共同开创设计事业，做出了卓越的成绩，是当时设计界的佼佼者，是位优秀的建筑大师和宗师。

在建筑教育的生涯中，他十分务实地强调整体的建筑认识、过程的教育、建筑本体的感应和感悟，培养了一大批建筑设计和理论人才。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建筑设计和理论的骨干力量都是他和一代先辈培养出来的，桃李满天下，誉满祖国大地。

从他的建筑活动来分析，他担任过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国际建筑师协会副主席，代表国家出席过各种有关建筑的国际会议，站在民主、正义的立场，为伟大祖国取得了荣誉。

为此我们在1981年编撰的《杨廷宝建筑作品集》的前言中，开场白的首句提以“披荆斩棘开拓路径，才知前进之艰难。长期从事建筑创作于复杂境遇之中，才能领悟成功的困苦。”二十年过去，回首当年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杨廷宝老师为人诚恳、朴实、谦逊、勤奋。他的待人接物，对社会的理解，对学生教育循循善诱都是出自内心的爱护。他热爱新中国、热爱党，一如既往，始终不渝。他关心国家大事，无私的奉献是一种榜样的力量。历史的阅历，多少次历史的教训，使他认识到，要发展建筑事业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他是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任江苏省副省长之职。在繁忙的工作中他总是精神矍铄，步履稳健，不辞辛劳地坚持在工作岗位上。他的工作精神是做到老、学到老，行进在建筑设计活动在世纪行程上，直至去世之前三个月仍在工地上指导工程设计，实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志不已”。他的这种精神，永

远体现着榜样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建筑师培育中永远值得后来者学习。

他晚年的心情是“沉寂”和“远见”,由于城市的发展,他特别关心注重环境的城市规划,关心城市建设。

他十分热爱大自然的环境和风景,对武夷山风景区建设提出了宜散不宜聚,宜低不宜高,要向民间乡土建筑风格研究学习,推陈出新。他曾说:“你能住在、生活在这自然中该多好。”他爱护大地上的一树一木,见到地方建宾馆,他总要求保护树木。他批评破坏自然林木的管理者,在选择桥位时总是让开景点,保护山林。他尤其关心古建筑历史文物的保护,他提醒当地的一些官员要保护古建筑和文物。每到一处参观古建筑群、寺庙、碑刻,他总默默地说,这是中国大地的文化呀,是历史的见证。一种历史的语言来看待今日的世界。他最后一次和我对话说:“历代皇朝,一代代的灭亡和改朝,为什么后代不吸取前朝的教训。”这次对话使我震惊和感动,他从小处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大事。他厌恶地方官员的大吃大喝,厌恶请客送礼,弄虚作假。一次从某地归来,送至他家门,他拿出一盒绿豆糕对我说“齐康,这盒绿豆糕,要不要上交?”再有住在上海锦江饭店,安排住套间,他说请领导换个双人间,我们住在一起,这样房价可以低一点。他那种廉洁奉公的精神印刻在我心中。不浮夸,不宣扬,总默默地做着他应做的工作。他待人以礼,凡来请他改图和请教学术见解,总平和待人,拿起纸张为人改图,务实地解决问题。他告诫我:“事情知道多是好事,但要成为自己的见识,处事过细是好事,但要辨别事务的两面。”他辩证地看待一切,宁静以思远,谨慎以行事。他总虚怀若谷地探求新生的事物,但对追求形式、不务实际,造成无谓的浪费表示不满。他在评价他同辈人及世界级大师时,既肯定一面,又指出他们的不足。他对赖特有很高的评价,认为是美国本土文化中的创新,是空间组合的天才,是处理建筑与自然的能人。赖特的创新风格,使他从心底里佩服,但对他那 Johnson 制蜡公司的一把把大伞经常漏雨的事,他笑着说:“这叫人怎么走,人少可以,人多了是多余的,局部可以,可不能用到大处。”我到南加州大学,看过赖特设计的小会堂的斜楼梯,确实不便。杨老对建筑观察十分细微,并注重人的活动,他说:“纽约古根海姆旋转展览馆,自上而下叫人一脚长一脚短地走,这样好吗?”他敬仰人,但又保持自己的看法。他对南京中山陵的牌坊认为有创新。但又不地道,陵前的华表没有必要放在两侧,古代有自己的章法,章法要因势利导。他评价中山陵与明孝陵,有自己的见解。

明孝陵从下马碑开始因势利导,因地形而曲折自然,从下马碑到四方城一直延伸至明孝陵的甬道,对地形运用得那么自然,具有深远的皇气,可惜建中山陵时将它断掉,现在已破坏殆尽,他为之遗憾。中山陵虽然有气魄却在一个暴露无余的大台阶上,而将碑亭放在中央。中山陵形似钟的总平面,一览无余,壁山而建,而吕彦直将西方的新古典加以中国古典屋顶手法的更新,那又非常了不起。时代变迁了,巨大的雪松掩盖了它,自然把中山陵衬托出来,又回归了自然。他常说自然是个融和剂,大概就是这个道理,他拜访过勒·柯布西耶事务所,他说:“柯布了不起,但不能用一种模式到处套,脚腿空透是好,但不宜处处使用”。从他的发言中,他总是如实而辩证地看待国内外的同一代人。

至于对他的国内同一代人,他总是平和地处理各种矛盾。他在谈论时会提到他们的优点,他说:“童老和我是亲密的朋友,我们各为其主,从不谈生意上的事,但常常在周末约好一起郊游。童老步测他的园林(即江南园林志),我总勾画那园林风景。”他常告诫我们青年人学习建筑知识非常重要,平时对砖、瓦、石、柱等建筑构件非常注意,并将防水看得很重。他来到古建筑现场时,总要看一下贴着墙的透气洞,注意中国木柱的保护,看到屋檐总要看檐深远与下面台基的大小。采光、通风、透气、防漏等措施在工程设计中,一点也不能疏忽,真是做到处处留心皆学问。他的这些熏陶使我常背尺寸、背比例陪衬的关系,他深深地意识到建筑及其群体大尺度把握的重要性,他说“我和梁思成先生在翻译Proportion这一词时反复推敲”,他们认为翻成“比例陪衬”为宜。我们从学生时代开始一直延用这个词,在日后的工程中,不论是新设计或改建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一个建筑师能否把握,能否在实践中操作,那是长期工程实践中的积累,是把人们的劳动、建设的结果用眼来观察。我想任何设计的天才如若没有实践,特别是实践的全过程,仍是走不到完美的境地的。虽是我们已进入计算机时代,但毕竟是辅助的。若无人脑创造性的思维,没有实践的认识和情感的感悟是难以整体完成设计任务的。

他在设计工作中非常注意团队的作用,他说:“当我接到任务,首先观察建筑所处的环境、地面的大小、地貌的现有物和树木,吃透了环境,随即比划我的构思。我总和杨宽龄工程师,研讨结构方式的结合,建筑不仅可靠而且取得合理性。我总在功能布置时想到人们的适用和方便,然后再动手,我绝不先想个形式,再去凑……。”这些我将在以后的归纳中来论述。

由于他有众多的实践和经验,他对问题的分析和实施的可能总不说死,给学生们的概念总是这也可以,那也可以。年青时代不甚理解,随着自身工程实践经验的增多,渐渐地认识到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总有各种可能,我们的责任总是择优而行。在工地上修正自己设计中和施工中的不足,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工地上的改图更为重要。他面对现实,一点也不马虎。我常碰到一些朋友对他们的设计说“只要做到见到大体外形,能否继续那是以后的事,反正我又看不见”,这种不负责任的思想和行为比比皆是,缺乏精益求精的责任,对青年人那是特别可怕的。于是我也常常说“不下工地不是位好建筑师”。设计质量的低劣,也是一种经济上的浪费。建筑寿命的缩短,更是一种无形的损失。

杨廷宝在他的设计中,不论是小住宅,抑或是公共建筑,非常注重建筑的环境。他的自宅(成贤小筑)设计就保持了原有的基础,利用有限的空间环境节约了投资,又与周围的林木相结合。和平宾馆的设计注重周围环境的四合院,又获得最大的效益。又如对待东南大学校园的改建和更新,他强调了大礼堂前建筑高度的限制和统一。他身体力行,30年代连接图书馆的两翼和中大院及大礼堂三座建筑的两翼,甚至在清华大学原图书馆的拼接中,都组织得天衣无缝,十分得体。他说:“一位建筑师在历史环境中做设计,不只是一要适配环境,而要求得风格上的一致性。”四座建筑的连接处在四个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功能要求,风格上传承和转化,取得了协调与统一。他做到此时此地此情,又达到彼时彼地彼情。经济条件的不同,工程的时间要求及业主要求,建筑师存在着一个如何对待时间和空间的处理,如何对待社会的经济、最后如何最大地对待人民的利益的问题。不只是近期的利益,而是长远的利益。建筑师的灵魂应当是在人民的心中,建筑师的心应当装着人民。我们讲人本,我们讲以人为本,从根本上来讲是怎样将城市的规划设计和建筑设计符合人民的最大利益和人民的需要。

从杨廷宝一生的经历中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设计使他得到平衡,他所作的成功的建筑设计,使他获得心理平衡,也有许许多多是与社会的机制不能合拍和不平衡的地方。特别他晚年来到武夷山,他对我说:“能在平静优雅的风景给我一席之地让我住下来,城市我不想见。”说实在,他在世界城市与建筑的发展中,在城市与建筑的诸矛盾中看到了建筑的反面效应。他在病床上还说:“天天高论历史建筑古迹的保护,却不时在看到、听到古建筑古迹被人为地破坏。”他深深地意识到不良设计的建筑带来的负面效应。他喜悦地迎

接着建筑科技发展的春天,也同时感受到冬天的寒冷。他心地里充满着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和情感,也不免带上焦虑。二十年过去了,历史证明了他的情感。一次在北京的一个星期天,我们一起到玉渊潭去画写生,他说:“好”。我说我25岁在那儿写生,那儿多么的野趣,那么的宁静,水中拔起的大树,那倒影多么奇丽,那光影多么光彩。但一下公共汽车,什么也找不到了。我内疚地画了几棵树,杨老异常地沉默,很长一段时间不说话。他淡淡地说:“我们回去吧。”杨老总是那么地平和慈祥,有一年来到曲阜阙里宾舍,他轻轻地对我说,这样一个环境,也只能这样设计。他评价之余,内心总是在揣摩。在曲阜带实习,天是那么的热,他和我们一起来到河沟里去洗澡,好凉爽啊!大家把衣服脱光,洗澡显出了人的本体形象,那么平易,那么近人。在1963年,中国建筑代表团到古巴访问,他西装革履,精神矍铄,他那风度,真是一种令人敬佩的建筑师,这又是一种人的本体,一种中国人民的精神本体。人是需要精神的,这精神是真实,内在精神的本体是一种象征。他反对新街口建高层,他深知一幢高层会带来无数的高层,他不出席这类的会议。但一次从镇江回来,家门口已等着市里的车子,我们一起被“押”进市府的会议室。记者、摄影师的镜头拍个不停,闪闪的光亮,照耀着他内心的“无言”。人生常会碰到这种违心的境遇。事物的发展总是矛盾的,这也就是历史。

和杨老晚年共渡的五年,深受他的教诲。他的一举一动,好像是无形言语,他正确对待了文革的“屈辱”,他挺过来了。在十年艰难岁月中,工宣队要取消建筑系,他轻轻对我说:“不能这样下去。”我深知杨老、童老内心的痛苦,知识分子的身心已被严重地挫伤,有形无形地摧残着他们。一生热爱的事业停滞,人际的矛盾,触及着他们的心灵。杨老对我说:“我还要走几步。”他有着他事业的最终理想。在研究所成立的那天,会议刚要开始,他对大家说“会议慢点开,等一会。”不一会儿童老被他请上来了,他对童老和大家说:“这是我们的家。”我们在研究所成立的前六年开始系统地整理他们的一生成果。他对我们说:“要看书,要实地调查,要从事设计,要总结经验。”省里任命他为副省长实在难为了他,他要面对一批行政事务、接待外宾、发奖状、视察……他步履艰难地登上三楼,他对我说:“我身不由己……。”于是他口述了“杨廷宝谈建筑”。我跟随他到有关地方考察,查有关资料整理他的最后嘱咐。他离开了他热爱、从未离开过的建筑事业,离开了祖国和亲爱的人世。

我较粗略地阐述杨廷宝老师的一生,目的是为了探讨这

位建筑界一代宗师奋斗的一生,他的背景和历程。关于他的学术思想的归纳我又五易其稿,试图概括他的一生,作为一种纪念他的学术哲理探讨,为后来者带来一个启示。

一、实践是建筑设计的基本,是建筑教育的重要环节。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学习,不断地总结和提炼。理论的重要在于和建筑师职业基本训练相结合。

杨廷宝先生八十二岁谢世,过早离开了世界。他一生最宝贵的经验,不论历史沧海的变迁,作为人类伟大文明的活动——建筑,他坚信营建城市和建筑群,要做出优秀的精品,造福于后代是他追求的宗旨。从职业的行为来剖析,建筑设计工作长达50年之久,不论毕业后在保尔·克芮老师身边的工程设计,那是追求建筑本身的设计,艺术造型设计,还是三十年代的实践,抑或战争年代,他都从未停止过他的职业活动。基泰工程司的建筑活动起始于天津、沈阳,尔后至上海、南京一带,甚至重庆等地,都在政治活动中心和较发达经济地区,这是由于建筑具有社会营建活动较多的经济条件。40年代开始他的建筑教育活动,先是兼职,后是专职。在四川重庆沙坪坝,在艰难困苦年代里,他坚持了教学活动,他和董寓、刘敦桢等先生,特别在鲍鼎先生的主持下形成了培养学习建筑的兴盛期,我们称“沙坪坝时期”,出了一批优秀的建筑人才。他勤于动手、勤于实践的精神在一代建筑师的培养中被视为典范,一种踏实、务实的作风,不空谈,十分强调建筑的功能和适用是实践的最重要的标准。他绝不是画几张图以自我陶醉为目的,常年在工地上,作出自己的努力,他不以“讲建筑为建筑”,不以“画建筑为建筑”,而是“多做建筑”的实际,这是一根红线。图纸是实施前奏,从图到物是要有实际上的经验判断,任何设计、创新离不开实践经验和理论的指导。理论的重要部分是人类实践的结晶。他在教学中注重实践活动、研究人的尺度,在大门框下总画一个人,以人为本为尺度,他说:“有两样东西的尺度应严格遵守,一是踏步,另一是栏杆的高度。”这是建筑尺度以人为本的最具体的起点。他十分重视层高的高低,因为它有很大的经济性。建筑之于环境之中存在一种环境的尺度的问题。他开玩笑对我说:“别看和尚庙,那方丈和尚在建设中也度量山门和其它的方位和尺度呢,有时还不断地修改”。60年代初经济困难,建设量很少。他要我们参加一些建筑讨论会,听听、看看别人的设计也增长我们的知识,就是你建一幢厕所也不容易,厕所要排除臭气,人工掏粪,冬天不受冷风,做好也不容易。就这样他教育学生“处处留心

皆学问”,观察社会的经济、社会、科技活动,要学生勤于记载,勤于用一根小钢尺来度量建筑的各个部位。我想我们已进入计算机辅助设计时代,人的感觉还是要通过自身的实践,人不可能事事实践,但经验的实践和提炼、学习前人、学习同辈,那是多么的重要。虚拟的、虚幻的是以实践中人的认识为基本,实践过程中不只是设计一幢建筑和一个建筑群,而是营造一种人居环境的情感,情感促使智慧的产生。实践可以从人的活动中、在实际操作中、实体的建筑及其艺术表现中带来情感,实践出真知就是这个道理。书本的学习非常重要,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那是非常可贵的。杨老厌恶空谈,不着边际的空谈,但又十分注重宏观的理论和指导,在城市环境设计中,他着力于“控制”和“把握”的研究。建筑师的能力在于“控制”和“把握”。我们从无限中“把握”那有限,从有限中获取“控制”。我们的认识可以跨越,但行为要制宜的“把握”,一步也不能松懈。学术的研究是创造的原动力,但心灵的感悟又来自实践,一种辩证、科学、历史的思考。

杨廷宝在实践活动中重视设计的技巧和技法,也就是战略和战术的关系,二者互动,互为因果。他对我说:“你喜欢抄图是好的,那是从图到图,但观察实物,对起号来那才更加重要。”他对实践也是批判的态度,他常进图书馆看书和杂志,他对我说:“不要被杂志上那新奇古怪的东西所迷惑,杂志上有的编辑总喜欢登载一些有刺激、新奇的建筑形式。”他还说:“城市大量的建筑和群体是普通的、普遍的。我们着眼点不只是几幢标志性的,更要看到面广量大住宅及其群体。新奇的、时髦的有时是一种误导。”我们勇于探索,那是一种前进,是值得鼓励,但寻求其普遍性,那更难能而可贵,从他实践的一生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整体和本体”的建筑观。

二、站在中国的土地上,从国情出发,依据地区、时间的社会与经济、技术的状况做出合理的设计,一种地区的制宜。

杨廷宝留学美国,回国前去欧洲旅行。解放前后,特别是担任世界建协副主席后,考察了世界许许多多的建筑,从古典到现代建筑,他深知科技的进步和现代建筑的发展以及地区的差异,他也深知中国建筑随着地区的不同、社会的变迁而发生着变化。建筑设计一定要结合国情、省情。在长期的实践中,做出切合实际的建筑是建筑设计的重要原则,也必须深知业主和使用者的要求,建筑外部内部的变化和变迁。他说:“我设计过近百幢建筑,几乎没有一幢建筑在实

施和使用过程中没有变动和改动。”建筑的功能和性质始终是设计的基本。他在基泰工程司的工作中，有一段时间是修缮古建筑，如北京天坛、国子监等著名建筑，在修缮过程中和匠人们切磋工程知识，了解古建修缮中匠人的口诀。他知道建筑的社会性、经济性和技术性。解放前后，他做过各种类型的建筑，如小住宅、医院、体育馆和体育场、纪念性的陵墓和纪念建筑、大学的教学楼和图书馆等等多种类型。国情、省情、社会的经济投入状况、业主的意图和建筑师的关系直接、间接地影响建筑的设计。他做过高标准的小住宅，也做过公务员使用的住宅，既有昂贵的用材，也有以竹笆为筋，粉上黄泥和石灰作外墙的简易建筑，因时因地的运用建筑设计的技术和技法。他观察细致入微，一次在故宫作画时，他说：“你看当时的总管，总是把最优秀的匠人用在最重要的建筑上，而后宫的一些次要建筑不论在建筑群体上，还是在组织上，就差一点了，匠人的水平决定建筑的优劣。”他又说：“同是一个歇山屋顶，中轴线上与两侧的就有差异，我们讲法式，很少有匠人用法式来建，都是由领班师傅来指点，建筑匠人的口诀，代代相传，法式只是一个总结。”他又说：“避暑山庄的入口，雍正年间先修，尺度都比较小，帝王们深知建筑的银两多少有关国力。”在实践中他深知经济对建筑的重要性。1953年在北京修建和平宾馆时，他注重了建筑环境，采用现代的手法。不少人说这建筑是受密斯的影响，又说是受到某种流派的影响。正好那时批判大屋顶，我问他：“您的设计思想究竟出于何处？”他淡淡地说：“当时周总理交给我这任务，是要快，要节约，要在短短的时间里，解决当时亚太和平会议的需要，遵循对速度和经济的要求，我没什么这个思想，那个主义。”这是深知开国期间建筑设计服从政治的需要，这件事得到周总理和建筑师们的赞赏，他并未想到以此来表现建筑师的个人，更重要的是服从国家的需求。北京刮起了大屋顶之风，当时在南京的高校也建了几幢，他对我说：“一定要简化檐下部，采用额枋、托梁来处理。”以简化的手法来适应建筑环境的需求。南京大学的东南楼和西南楼几乎同时修建，采用了简化大屋顶，他在南京工学院五四楼的设计中更采用了简化设计，至于设计的动力楼，是一座比例合理的现代建筑。他十分注重经济和造价，满足了当时教学的需求。我们讲国情、省情的地区建筑，最大限度的想到经济投入的程度，他的“把握”和“控制”是十分得体的。从建筑的修建来说，还有着时间、空间的因素和地区工程技术的水平。国情有地区的差异、有社会和经济的状况、有地段的特点，有建筑的性质和实施的可能。地区

主义的核心，那就是制宜，我看没有比因地制宜更重要的事。再有就是建筑文化的上层建筑，杨廷宝说：“时间的协调将建筑永远融和在大自然和城市之中。”南京中山陵音乐台的设计，造价是十分有限的，他利用地形，周围回廊的花坛，他用了经济适用的斩假石，他说：“斩假石，施工技术好，经过岁月可以达到石砌的艺术感觉。”修建谭延闿墓时，他采用北京被破坏的公主坟的华表，将它搬来“装配”在墓前。他因势利导地根据地形、水流、树木组织一种自然的空间序列，并获得了成功。他反对用“丁字尺”、“三角板”来做规划，而注重结合地形修建道路和建筑，因势而利导。

三、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探索建筑文化的传承、转换和创新。

杨廷宝先生在美国学习的时候，正值新古典主义向新建筑的转换时期，他说：“连我的老师也不得不向新建筑转。”但回到国内正碰上一种“国粹精神”的复古，在这种交汇中可以看到他建筑风格有了一种时代的变化，两种文化的冲突和矛盾成为一种风格上的抉择。从他的设计过程来分析，虽然依照业主的要求，但也看出他设计的多样性，他那熟练的技巧既符合当时业主的要求，同时产生一种中国传统的新风格，如原中央研究院的大楼，他仿河北正定隆兴寺的摩尼殿，又创新地将大会议室和办公楼做成一种对称中的不对称，将传统建筑结合得非常自然和得体。他大胆设计的建筑有现在南京中山东路的档案馆和陈列馆，又称东宫、西宫。同样采用大屋顶的方式，但他摒弃了传统檐下复杂的斗拱。他在风格上传承的转换是合乎逻辑的简化，一种新的中国风格的手法。他常说：“古典的比例，现代的手法，是一种人们可以接受的现代建筑。”南京延晖馆的设计就设计得那么现代，至今看来也不落俗套，完全是现代建筑的创新。沈阳老火车站，它大胆地将传统欧洲车站现代化了，用了车站的符号，创造出一种新颖的形式。同样在南京老火车站（下关），也是用拱形来作车站的标志。我们从它的作品系列看出他设计的踪影，他的运作轨迹，从起始阶段带进美国现代的新古典直至延晖馆以及和平宾馆的现代建筑，虽然是业主的要求，他还是把握建筑时代进程的脉络。他求实的作风，达到了多样而统一。他没有哗众取宠，看得出他强调以功能为基本的设计思想，形式的变化是表象但如实反映了功能的要求，他把握住了而又有超越。他的前进是稳中求进，一种有理有节的跨越和前进。这也是他为人作风在建筑内容和形式中的反映。他的设计思想受到社会体制、制度的制约。但是他前进了。

年青的建筑师看了延辉馆,也不由得惊叹他在建筑设计中的杰出成就。

传承,转换,创新首先是思想上的创新。他个人性格中的稳健也不排除他对自身风格上的“新”的探求,可惜时代给予的局限。前半生,国内战争,日寇侵略,国力衰退,民不聊生,没有研究的机遇,他的设计步履艰难。他没有路易斯·康的机遇和新建筑的大环境、大氛围,但他却不时地闪耀出创新思维的火花。时代给予设计者的制约,我们不宜苛求,我们只是从他设计思想的进程中窥视他的转换。即使微弱的、个别的也看出一代宗师思想和求实创新的精神。

我常想年青人从时代的视野去分析前辈,用时代的眼光,那是科学的态度。设计的素质和精神的素质永远结合在一起,设计的心灵永远以现实为基础感应拥抱着在一起。正确对待我们的前辈才能正确对待自己。人的一生那么短暂,老一辈经过、跨越的时代不同,艰难困苦不同,他们前进的每一步与我们今天社会的创新有许多本质性的不同。适时的、务实地评价前辈是对老师最大的尊重和崇敬,我们需要有这种治学态度。

四、将建筑看成是社会人的建筑,辩证地对待建筑事物的变化,了解实施过程又注重其结果。

杨廷宝一生跨越了两个时代,他看到了旧中国人民所受的苦难,他看到中国人民所受的屈辱,他对我们说:“我在国外学习,或在欧洲旅行,一些外国人总鄙视我们,总说着‘秦’‘秦’,现在翻身了。”他那热爱祖国的心情可想而知,解放时,他可以离开大陆,他却毅然留下执教。时代不同了,建筑是为人服务,这个“人”是有社会人的属性,是有阶层和阶级,是有富有和贫困。我们讲以人为本,即是一种人本的思想,最大利益的为人民服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一种时代的需求。在武夷山景区作画,在中山堂边上有一幢十分破旧的小学校,课桌椅零乱而破烂,屋顶是漏水的,小学老师没有备课的条件,有时只能站在廊檐下,听着孩子们读书,书声朗朗,我们看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楚。小学校长知道他是全国人大代表,向他反映,要求只是把修武夷山景点的“下脚料”来修补这座学校的校舍,对此事他让我即刻反映,不但修好了教室,后来由赖聚奎同志设计了一个全新的学校,并由地方政府出钱建造,他关怀着人民。建筑的属性是为人,为社会服务,可惜他未见到这座新校的建成。

建筑有着众多条件的制约,它受到经济、业主、投资、

施工、使用者、土地和必要的设施的影响,在城市和建筑营建的过程中,受到了众多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变化,绝不是单凭建筑师个人的设想、观念去解决。杨廷宝在长期实践中深深懂得这种变化的脉络。要从诸多复杂的矛盾中去寻求科学、合理的设计途径。凡看到甲方、设计者来请教,他总默默地沉思,他很少口头上回答,而总是拿张透明纸亲自改图,探讨可能性,总是“你们试试看”,他亲切和蔼的面容,感人肺腑,他总是把客人从办公室一直送到大门口。他深知人的交往是一种友谊和友善,表现在图纸是一种情感 and 情谊。但他对不理想的设计或做法,又是那么坚决否定。深感建筑师的素养多么重要,在诸多的变化中探索,拿出自己的主见和观点。事前事后的对比,一位建筑师要有时代的观念,要跨越,要预见许多事,这时以为是对的,时隔多少年后又为之惋惜和遗憾。人们常说建筑艺术是个遗憾的艺术,因为一旦建成难以修改,实施过程中的把握多么紧要,过程中的修正为的是结果,结果反映的是社会的建筑,城市的建筑,它连续几十年,上百年。我们要有预测,预测从哪里来,从书本中来吗?从道听途说中来吗?从哗众取宠中来吗?有的建筑师只要看到它一时的形象美观,刺激人们求新的心态,获得一片“表扬声”,“获得某种大奖”。它的使用,它的命运,置之度外,这种不科学的态度是不可取的,更有甚者,一旦建成尚未使用就请专家们来“炒”,自以为炒作就成真理,却不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杨老的谨慎不是一种保守,而是一种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我们需要有这种精神。我们常听到他讲“这也可以,那也可以”,这是他的口头语,事实上是反映建筑与人、与社会、时代的变化,一种真实地区主义建筑设计的态度。他的心态那么宁静,那么深远,是我们一代青年人学习的榜样。从他的实践经验中,使我懂得了要不断地反思,工程做得越多,越要有自己的反思。反思和检讨,不断调查自己设计过的建筑的使用、坚固、美观等等,反思、检讨使自己在设计中再取得一种进步。杨廷宝虽未写出厚厚的“大书”,虽未口若悬河地空谈理论,但他知道建筑实践的真谛。每想到这一点我心里总不平静,所以我写了一篇散文称之为“花环和套环”,设计的过程在不同的环境中要求得一种新的“和谐”,“入境”和“出新”。这是个多么艰难的过程。身上得到了荣誉一切归功于人民,归功于老师,我在散文中写到,要亲自将那花环上的花朵,一片一片地摘下来让溪流漂走。杨廷宝的建筑思想,我们说实践是第一性的,实践中要十分注重过程,没有好的过程,怎么会有好的结果。我们追求的是将过程和结果统一起来。

五、尊重自然环境与建筑、城市的融合，尊重建筑历史、科技的发展，不断适时的提高建筑文化境界。

杨廷宝的一生，从自身的实践中意识到建筑不只是社会的建筑，也是社会人的建筑，人民的建筑，要做到这一点要十分注重“本体”和“整体”。他晚年更加关心城市的建筑和建筑环境的塑造，这样才能将建筑和城市生根在大地上，使建筑成为一个有生气的建筑，一种活的建筑，可以再发展的建筑。这个整体对于环境而言是相对的，建筑相对于室外环境和城市，而城市环境又相对于地区的城镇体系，整体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环境相对比，相协调，相融合。整体观念也就是环境的观念。整体的观念又相对于对建筑本体的认识。我们讲建筑的本体是要不断寻求建筑发展、保护，控制规律性的表现，建筑的本体是要研究建筑、建筑群与内外空间的关系，这个本体是研究人与建筑认识上、行为上、生理、心理的互动，建筑物整体和局部美学特征，更是功能适用、技术、科学的关系。本体的根本是人和建筑。美学的特征又是千百年来人类经验的总结，地区人的习惯，民俗风情的情趣对建筑的影响。所以地区、地域性的研究，从大到小、从高层次到一般都着落在建筑的本体上，特别是人与建筑的比例陪衬，建筑结构技术、材质的变化、科技发展、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影响，归根到底是一种力的作用和反映。

我们讲存在就有意义，那么诸关系的相互作用同样具有意义，我们从意义的本质去探索其形式，从符号中寻求其变化，一种转换的思想。一部建筑史的发展，实际上是建筑意义的转换，科技的创新的变革，既是结构性的，又是内容和形式的。杨廷宝的建筑思想中重要的一条是尊重自然，尊重历史，这实质就是尊重人民，因为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历史是延续的，是可以借鉴的。一位建筑师对自然、历史的

尊重，就是尊重自己的职业，尊重历史和自然，是一种宽容的态度，一种敬业的精神，一种孜孜不倦的精神！人类的聚居从自然而起，而又从对抗中认识到返璞归真，我们不妨把建筑的一切现象看成是一种自然力，最终要服从这大自然的规律，成为自己的行动。一位有识的建筑师要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又要从人民利益出发，以自己的职业训练，全局性认识城市和建筑，教育和普及建筑知识，使人类聚居的载体成为一种最高文化的境界。在国内外，在中国历史上曾创造出人类无比灿烂的建筑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在中国快速发展的今天，要提醒人民重视建筑文化，境界的追求永无止境，融合、协调、制宜、适配这种思维，以哲学思辨的态度对待建筑，摒弃那自以为是，不懂装懂，而是探求真实。杨廷宝说“大自然是调和剂”，言短意长。建设的浪潮像一层层的波浪向前推进，但那飘浮的垃圾永远会成为一种“渣滓”。

我赘言杨廷宝的建筑学术思想，因为一种有使命感的学术思想和活力会是永恒的。正确的思想，在漫长的建筑进程中会得到认识和发展。

今天我们纪念杨廷宝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深情缅怀我们的老师和他为之奋斗的建筑事业和教育精神，怀念他身体力行、淡薄名利地为人民服务，至诚地对待友谊和教育后代，学习他追求的制高点——人民的建筑文化。

最好的纪念是学习，最深的纪念是实践。敬爱的老师，我们一定不辜负您的教诲，在思想上做到为社会、为人民服务，在业务上精益求精，踏着建筑先辈的脚印，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前进的道路尚有许许多多的困难和困惑，我们定将克服，因为我们意识到最大的力量是宽容和团结！

恩泽绵长——忆杨老

钟训正

1948年刚考入中央大学建筑系时,有一位深知中大建筑系情况和本人夙愿的知情者诚挚地祝贺我选择了理想的学校,最好的系。一踏入建筑系的大门,就得悉我系有悠久的历史,拥有最优秀的师资队伍,杨、童、刘等先生的名声响彻耳际,更得知杨老已蜚声中外。当时,杨老的若干作品作为最优秀的建筑范例,鹤立在那时的首都——南京市,也得知杨老留美时成绩出类拔萃,曾得几次大奖,给中国人扬眉吐气。杨老在学成归国赴欧考察途中所作的水彩画已达到炉火纯青、超凡脱俗的境界。当时,在我们的心目中,杨老的形象非常崇高,是我们的景仰对象和理想目标。回想起来,令人惊异的是那时的杨老只不过47岁,达到水彩画水平的顶峰其时也不过26岁左右,可悲的是我们在这一年龄段还几乎是一张白纸。

在我就学期间,杨老是系主任,我们私下里称他为“杨老板”,“老板”是出了名的严厉,给我们“刮胡子”(批评训斥)是家常便饭,在这一点上,我恐怕算是“得宠者”。我们在一年级的素描课是杨老亲自教的,每次带了教具来一年级的所在地丁家桥上课,有的教具还是沉重的砖雕。当时我们野性未驯,心态浮躁,不耐心细磨慢琢,四个钟头的作业时间一个钟头就完成了,其成果的粗糙可想而知,自然就招来杨老一阵痛“刮”,说以后要加倍延长作业时间。在一年级上学期倒数第二个作业是渲染希腊Doric柱式,最难处是方帽盖对双曲圆鼓形体块的阴与影的转换,我们的浮躁风到了极致,有人索性给背景涂上毫不稀释的浓墨,结果全班只有两个人勉强及格。杨老当着全系同学的面(全系学生都安置在一个大图房内)对我们严加训斥,说:“如果你们马马虎虎,不想认真学习,就趁早转系”。对最后一个总结性作业——西洋古典构图渲染,我们就不得不认真对待了,但某些方面还免不了故态复萌。我在描绘一个希腊柱式的檐部时,原图上有卷草花纹,我想偷懒不画,杨老一看倒是“刮”得很直接了当:“你想偷懒就不必学建筑了”。后来这个作业我们都很尽心尽力,态度特别认真,在接近完成时,杨老居然喜形于色,兴奋地请来童、刘等老先生,巡视一遍后说:“我看这一班将来大有希望”,久旱望云霓,久“刮”之后好不容易得来这么一句赞许的话,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次极大的鼓励,最后我班的成绩都很不错,我得了最高成绩95分,倍增了我学习的信心。在一年级下学期第一个设计题规定以西方古典手法设计一座公园桥。当时我的创作欲望很高,面对设计的处女作,自然要发挥一番,使出了浑身解数,添这加那,意犹未尽,全然不顾古典法式的严格约束。杨老在改

图时要删改的正是我呕心沥血自鸣得意的“精华”,我不肯割爱,犹作困兽之斗,弄得杨老忍无可忍,严肃批评我是在干一般泥水匠的活。杨老在教学上很务实,很注意与国情的结合以及现实的可行性。他很反对囫囵吞枣地生搬硬套国外杂志上的新时髦,对我在设计上常出现的“新潮”总是毫不留情地予以否定。杨老对我的重锤敲打,虽然有时弄得我灰头土脸,甚至使我有难以忍受的痛苦,但痛后反思,继而改正,每改必有明显的进步,使我受益匪浅。

回想求学期间,全系学生都学习和生活在一间大图房里,彼此都很熟悉,一方有事,多方支援,杨、童、刘等老先生每天都来图房,我们受教的机会特多,尽管挨“刮”的机会也多,得到的指导倒还是细心和耐心的。那时的政治运动较多,但老师的高度的责任心弥补了学习时间的不足。那时我系的学制是四年,虽然因当时祖国建设的需要而提前一年毕业,我们所受的教益倒还是颇为丰盈的。在我们的学生时代,享受了和睦大家庭的温馨,每逢元旦迎新,在盛大的师生大联欢会上,定有杨老的舞剑,或太极拳或翻筋斗,以及童老的讲笑话等等。那一段美好的日子实在令人留恋。

杨老在国际和国内都有很高的威望,因为他处事公正无私,决不压人之长,护己之短,坦诚待人。在矛盾重重的建筑界,都能得到各方面的拥护和爱戴。杨老的无私绝非无情,虽然在教学工作中铁面无私,平时却平易近人,对同辈很尊重,对晚辈既爱护又关心。1952年我毕业后分配至中南区,先后在湖南大学、武汉大学任教各一年,杨老得知我学用并非一致,亲自要求高教部调我回校。当时越区调动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高教部下调令到武汉大学,武大按兵不动,后来杨老在人大会上与当时的杨秀峰部长重申调动一事,高教部去电催促,终于调动成功,我满怀幸福感回到了杨老身边。1962年我参加组建了杨老的研究室,虽然那时国家经济紧缩,设计实践很少,整个研究室倒也生机勃勃,欣欣向荣,像一个和睦温馨的大家庭。杨老对我们关怀备至,令人感动的是当我们春节赴杨老家拜年后,杨老竟亲自登门回访。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在学生时代挨刮挨批,一到工作岗位,再也没有听到严师的刮和批了,不知是我真的自觉了?还是已定型到无法再教育改造了?抑或是岁月的消逝使杨老变得更慈祥了?!文革以后,学校重组杨老的研究所,杨老亲自两次登门邀我入所,并建议我可自带科研项目,后因一些客观原因婉言谢绝了杨老,杨老似乎也能理解。至今,我仍然深感内疚,一是辜负了杨老的信任,二是失去了亲聆杨老众多教诲的机会。杨老去世后的1984年,我有机会出国

访问,在决定出国人员的出访国家时,当时的副校长王荣年先生召集出国人员谈话,言明:“赴美国访问的只能有两人,一个是专业所需要的三系×××,一个是杨老生前就跟校领导叮嘱过的钟训正,杨老那时还说要写推荐信给贝聿铭”。在这以前,我一直不知道出访美国一事竟是杨老的遗愿之一,我为杨老对我的关怀既深怀感激又深感歉疚。

杨老一直很关心对年青师资的培养,我在第一次开《构图原理》课时,杨老组织了试讲,对惶恐不安的我给以鼓励。那时教研组内经常开展学术活动,较多的是对青年教师的设计课题试作进行评议。另外就是绘画的展览和评议,一学期有几次,几位老先生都参加,点出优点,指出不足,明确了我们奋斗的目标,使我们获益极大。50年代中期,我曾着迷于美籍匈牙利人考茨基(KAUTZKY)的铅笔画,认为他用笔刚劲有力、豪放洒脱、简洁概括、层次分明,潇洒的寥寥几笔,立见效果,特别适用于快捷草图。于是,对他的画风刻意摹仿,有一个暑假,尽摹考茨基铅笔画册的全部,然后,以考氏画风用之于写生和描绘照片资料,乃至人物画,工作几乎达到狂热的程度。那时得到多方面的褒扬,自以为已得考氏的精髓,欲定其为今后自己的风格和努力的方向。杨老看了很不以为然,正在我得意忘形之际,给我泼来一瓢冷水,他恳切地说:“你年纪还轻,不要过早建立自己的风格和独家手法,更不要以他人的风格来束缚自己,应博采众家之长,勤学苦练,融会贯通,日久自然水到渠成。某一家的独到手法也须经过他本人的刻苦探索、千锤百炼,才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虽得之不易,但并非就十全十美,无可挑剔。如考茨基的画刚劲有余,柔润不足,表现领域不是那么宽广、层次表现也较简单……如果你仅学此一家,形似易,神似难,你不可能得其全部精髓,也不能全部消化为己所用,进一步发展很难,超越他更属妄想,除非你改弦易辙,广采博纳……”(大意)。他又说:“用笔的简练、豪放、传神,必须出自深厚的功底。不要看人家传神的寥寥几笔,该凝结了多少年的心血。粗要出自细,从功深的细得到解脱和无羁的发挥,才能获取神韵……”(大意)。杨老的这番教导,给我的震动极大,动摇了我的根基,否定了我过去引以为骄傲和拿手的“看家”本领。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决定:改!从新开始。首先,在工具上我丢掉削扁了笔头的VENUS 6B铅笔,改用2B的细铅芯。再就是搜集了几位名家的作品,细细品味和琢磨他们各自的特点,探析它们的构图、笔触,各种质感的表现,省略和提炼的办法,全局整体性的把握,氛围和意境的表达……留心之余,眼界大为开阔。那时,特

别仰慕的是OTTO R. EGGERS,他的画细而不腻,严而不僵,雅而充实,意境深邃,场景开阔,刚柔并济,收放自如,有了这些范本和对它们的探析,加上自己对光影、层次、空间感等等的推敲,我以风景图片为题材,画出了大批习作,那时几乎进入到忘我的境界,也似乎发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天地。此时,反观自己考氏风格的作品,只觉粗浅浮躁,不堪入目。那时作画我很注意快慢结合,也画了一批时间紧迫的快速写生,虽然考氏风犹存,但多少还有一点自己的特点。后来,有机会在国内外见到不少优秀作品,各种书刊中也展现了一个多彩缤纷的世界,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一经对比,自觉达到艺术的高超境界,路途实在遥远,就以KAUTZKY和EGGERS的水平来说,我至今还难望其项背。艺海浩瀚,穷毕生之力能自由地遨游一角,就算万幸了。我想,如果在关键时刻不是杨老为我点破迷津,促使我痛下改革的决心,我恐怕还陷在浅薄狭隘的小圈子里而不能自拔呢!

在做人方面,杨老曾不止一次地劝说我:不要在乎一时的得失,不要在意不公平的待遇,即使受到一点委屈,也不要过分计较,你还是要做你该做的事,只要你工作有所成就,对社会有所贡献,自然会得到公众的承认。杨老的这类谈话,一直成为我处世的座右铭。

杨老在指导我们的设计时,常有不肯定的语句:“也许”、“可能”、“这也可以”、“那也行”。那时私下里认为处事总该有真理和原则吧!正确的答案只会有一个。当时的我,思想单纯幼稚,加上血气方刚,看问题绝对化、简单化,还自以为是非分明,果敢干脆。日久天长,经过生活和工作的不断磨炼,慢慢悟出这些不定语句的真谛,对设计创作来说,本来就“条条道路通罗马”,绝非只能有一条康庄的“真理”大道。影响创作思维的因素繁多,其物质、技术、精神和社会诸因素的孰轻孰重,均可带来迥然不同的结果,如果认定只走一条常规的“真理”大道,就可能只得出千篇一律的平庸之作。如果走出其不意的险着,虽然为此要付出艰巨的劳动和无穷的智慧,往往倒可以从“山穷水尽疑无路”到“柳暗花明又一村”,也许还可到达更高的境界。杨老的富有哲理的“模棱两可”的话绝非丧失原则,他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就是正气凛然地坚持了原则,在教书育人上绝不敷衍了事,“刮”,就是原则的另一种高度体现。在设计创作上,虽然“条条道路通罗马”但毕竟还有不容否定的客观原则。杨老在原则问题上是一毫不妥协的。南京在“鸡鸣寺”地区市政府的正对面,隔和平公园的北京东路上有一坐南朝北的基地,这块基地可说是“兵家”必争的一块宝地,问津的业主和设计方

案历经更迭，后来设计了一板式高层的办公楼方案，设计者假传“圣旨”，说已得杨老认可，于是，施工单位，建筑材料，混凝土桩进入现场，只等市领导一声令下即可开工。杨老得知此事后，气愤地向市领导严正申明他的否定意见，他极力反对以板式高层的大片阴面正面面对和平公园和市政府，力主此基地和建筑应属市民共有。在他的坚持下，终于推翻了此方案和更换了业主，最后由我本人设计成临街为三层的南京科技中心（后改名为科技会堂）。

杨老在亲受教诲的年长一代的心目中是严师，在少有接触的年青一代的心目中只有慈祥，其实，他两者兼而有之；在一个大“家庭”中，他既是严“父”又是慈“母”，如果

称他为建筑界既严且慈的祖师爷，恐怕更为恰当而且也当之无愧。

在90年代初，我写了一篇名为《成长的烦恼——回顾与反思》的文章，登载在《建筑文库》中的《建筑师修养》一书上，其中一部分是讲我在成长过程中杨老对我的教诲和影响。后来稍加改动，题名为《悟性与勤奋》，录入《中国工程院院士自述》一书，归类于《恩泽与感怀》。此文也就摘录了《回顾与反思》的部分内容。“恩泽与感怀”的命题，倒触发了我对杨老的追忆和悼念，总之，如果说我今日有所成就的话，应该归之于杨老的谆谆教诲。